

【明清卷】

章文欽 箋注

澳門詩詞箋注

珠海出版社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

鏡海波瀾連北國
蓮峰蒼翠展華章

章文欽教授澳門詩詞集注出版九週年紀念
章文欽



南國之風流
詠鏡之故實

羅中興



序 言

黃天驥

在澳門回歸祖國的前夕，我讀到章文欽君的《澳門詩詞箋注》，感到分外的高興。

對我來說，澳門是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記得在抗日戰爭期間，廣州淪陷，我跟隨父母到澳門避難。那時，澳門兵燹不到，依然是一方淨土。節日時善信擲着菩薩神像吹吹打打地出巡；黃昏時鑼鼓八音在街頭演奏；夏日中白鴿巢的一片濃綠；華燈初上十月初五街的一片繁囂，在我幼小的心靈中有着深刻的印象。其後，離開澳門多年，等到有機會再到澳門訪問時，發覺市廛大變，一切都很陌生。這次，承章文欽君不棄，我讀到《澳門詩詞箋注》，仔細體味詩人們所寫風物，竟怦然心動，有如見故人之感，而且，詩人們吐露的心聲，也很容易引起我們這一代人的共鳴。

我讀章文欽君的《澳門詩詞箋注》，收獲最大的是彷彿看到了四百年澳門歷史、文化發展的圖景。這部書，載錄了幾百位詩人在澳門居停或過往時發出的心聲。它是在不同的時期中澳門人文精神面貌的寫照。至於松山媽閣，漁火風濤，山川變化，世事興衰，種種景象，也通過騷人墨客的詩筆，一一呈現。這一篇篇的詩，是一頁頁歷史的見證。但詩

章散落各處，不易搜求，假如不是章文欽君窮十年之力，把滄海遺珠一一撿拾，淘洗整理，我們就無法感受澳門建埠以來的史詩，當然，也將無從看到這一部實際上是反映四百年中西文化交融的詩史。

我國的歷史學家，以陳寅恪先生為代表，開創了以詩證史的研究傳統。詩歌作為文學創作，講究意境意象，詩人在創作時，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感受到時代的氣氛。而他們的順筆揮寫，卻往往能讓後人透過詩的意象看到歷史的真相。因此，以詩證史，實應視為史學家在學術上的一種創獲。陳寅恪先生曾在中山大學工作多年，他治學的觀點、方法，對後輩有深刻的影響。章文欽君從七十年代末，即在康樂園求學問道，師從戴裔煊教授研究澳門的歷史。他結合自己的研究，搜集歷代有關澳門的詩，通過詩，看到史；也利用詩中史料，寫出多篇有關澳門歷史的論著。很清楚，他紮實地沿着前賢開拓的道路，選擇東南沿海中西文化的結合點進行研究，作出有成效的探索。

《澳門詩詞箋注》選錄作品的數量之多，質量之精，可以說遠超過任何有關選本。最能說明選箋者工力的，還在於該書的箋注部分。要知道，古往今來，在澳門詩壇上留下雪泥鴻爪者，代不乏人，但不少人不見經傳，其生平事跡、生卒年月，極難查攷。令人欽佩的是，章文欽君竟能把許多人的生活經歷攷證清楚，並且補充了一般史傳之不足，為今後研究澳門有關人物與歷史，提供了重要的基礎，其價值不可忽視。在介紹作者的文字中，章文欽君以知人論世的態度夾敘夾議，筆法平實，卻能給人以啟發。

為詩詞作注，自然要把詩中典故解釋清楚。章文欽君的《澳門詩詞箋注》和一般詩詞選本不同，在於能着力詮釋與澳

門史事有關的條目。而要做到這一點，假如不是精通澳門的歷史，是根本無法入手的。像在道光年間，澳門發生過沈志亮刺殺兵頭啞嗎嘞一事。這是晚清澳門史上的一大事件，當時許多詩人在詩作中都曾影影綽綽地提及。章文欽君在注釋劉燾芬、潘飛聲等人的詩歌時，由於飽覽了各種有關文獻，甚至搜求到黃遵憲之父黃鴻藻所撰的《逸農三筆》等有關資料，對沈案來龍去脈有清楚的了解，因而注釋劉、潘等人的詩歌時，其玄奧處均能披郤中竅，一一道出。正因為章文欽君是在弄清楚整個澳門史的基礎上，箋注澳門詩詞，便能發人所未發，能在深層的意義上闡析詩詞的涵義。我認為，像章文欽君那樣具有鍥而不舍的精神，具有寬博嚴謹的史識，是能夠舉重若輕、出色地完成繁雜的工作的。

在翻閱《澳門詩詞箋注》的時候，我常常想到，作為人文科學或者社會科學的研究者，有一個如何貫通文史的問題。近幾十年，許多學者特別是飽受禁錮之苦的學者，在狹隘觀念的影響下，往往把文和史兩個領域隔絕開來，學文者祇讀詞章，學史者祇重史實。結果，學風或傷於浮泛，或傷於沉滯，均不可取。在過去，史學大家或文章宗匠，走的都是淹通文史的道路。事實上，文與史，也不可能截然分開。年青一輩的學者，尤應檢討前人的誤差，治學時可以有所側重，卻不應偏廢。我很高興地看到，章文欽君注意到文史結合的問題。這部《澳門詩詞箋注》的出版，說明了他在學術上有意識地走自己的路。

前幾年，我和章文欽君訪問過澳門普濟禪院。隨喜庭院之際，得悉歷年神州名士，絡繹南來，聚集於此，留下了一批墨跡，深感這幽深禪院，竟蒼萃着經歷劫灰的中華文化，成為歷史文明的縮影。這次翻閱《澳門詩詞箋注》，也從文字中儼然看到傳統的澳門，領略到澳門的傳統，產生了一卷在手，盡

閱風騷之感。我相信，這部書的出版，將是澳門文化史上的一樁盛事。

我和章文欽君雖同處一校，但交往不多，通過姜伯勤教授的紹介，捧讀他一些論著，纔知道他勤奮過人。他囑我為《澳門詩詞箋注》作序，出於向歷史系師友學習的意願，我不揣淺陋，貿然執筆。而在檢讀的過程中，赫然發現書中收有我在大學時代的老師陳寂先生和初中時代的老師程孔碩先生吟詠澳門的遺篇，這使我一則驚喜，一則感慨。我還記得，在少年時學作的第一首詞，是由程老師在南海中學批改的；在大學時發表的第一篇學術論文，是由陳老師指導的。掩卷緬懷，老師們音容宛在。所以，讀章文欽君這一部書稿，對我來說，既是學習，也是機緣。

1999年1月5日於中山大學

自序

章文欽

經過十餘年的努力，全書三卷，近百萬字的《澳門詩詞箋注》，將於近期內由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和珠海出版社聯合出版，作為本書的箋注者，內心的喜悅是難以用文字來形容的。

箋注者雖為一名史學工作者，與文學的因緣，卻可以追溯到童年時代。由於父兄的影響，師長的栽培，自幼酷愛文學。因為家貧，從九歲開始，白天上學以外的時間，從事過多種窮孩子所做的勞動，掙得的一點收入，全部交給母親，補貼家用。夜裏在煤油燈下做完功課，常常偷讀一些借來的連環畫冊及初級文學讀物，每因太費燈油而受到母親的干涉。一年中最開心的日子，要算正月初一、初二兩天，不用勞動，走進出租連環畫冊的小鋪，用大人所給僅有兩毛錢的壓歲錢，租來十多本連環畫，一頁頁、一本本地仔細咀嚼，消磨這兩天的時光。

1967年，在故鄉汕頭市一家半官方的小報當記者，每月有六圓的津貼，其時家境稍寬，不用全部上交，走進新華書店，居然買不到一本自己喜歡的文學書。次年，一個偶然的機會，從一位初中同學借到幾本五十年代高中的文學教材，接觸到詩經、楚辭、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以及先秦諸子、唐宋八大家等中國古典文學的部分內容，成為自學中國古典文學的開始。

同那個時代許多自學青年一樣，沒有老師指導，書籍奇缺，使自學生涯學步維艱。卻使人十分珍惜所能讀到的每一本書，哪怕是殘篇斷簡。由於大多數書是輾轉借來，祇得拼命抄

錄，由此養成邊抄邊讀的習慣。好在年輕，記憶力強，不少詩詞抄讀之後，即能成誦，反複尋味，似乎也就“無師自通”了。

1970年5月間，正在抄讀張向天的《魯迅舊詩箋注》，長兄文間突然去世，年僅二十八歲。他酷愛文學，尤喜作詩，十八九歲便在本地和廣州的報刊發表詩作，身後還留下一本手抄的詩集。抄讀着魯迅“何事鵲鵲偏傲我，時隨帆頂過長天。”（《憶諸弟》）“奈何三月別，竟失爾奇躬”；“獨沉清冷水，能否滌愁腸？”（《懷范愛農》）一類的詩句，沉浸在雁序失行的悲痛之中。

同年，高中畢業後，到韶關芙蓉山下一家工廠當學徒。工餘時間，常常攜着書本，走遍周圍的山山水水、田野村莊，尋找風景清幽之處，坐下讀書，夜間則在燈下抄讀。抄讀得最多的仍然是古詩，漢魏樂府、建安正始、三唐兩宋，皆抄讀了不少，而稍及於詞，以及中國文學史、文學理論一類的書。

然而，找書還是十分艱難。曾讀《史記·屈原列傳》，見屈原臨沒，作《懷沙》之賦，負石投汨羅以自沉，便十分渴望拜讀這位千古高賢的絕命辭，夜間居然夢見在路口垃圾箱傍撿到一本破爛殘缺的《懷沙》，如獲至寶。一覺醒來，悵然久之，作一小詩：“棄道舊《懷沙》，揣懷滿心歡。渴書一如此，不夢入‘新華’。”當時每月有十多圓至二十圓的生活費，極願節約幾圓，買幾本自己喜愛的文學書，這些書在新華書店仍然無法買到。後來讀到《楚辭》，始知《懷沙》為屈原《九章》中的一篇。

讀書稍多，偶有所得，曾嘗試着寫一篇論詩的文章，投寄《詩刊》，雖未刊用，卻得到該刊編輯一封熱情鼓勵的來信。日徜徉於山水之間，遇景而發，或有感於事，亦嘗試着用騷

體、舊體或新體作一些自以為是詩的篇什，不計工拙，更遑論韻律平仄。其中有一首《山間春雨》，作於芙蓉山下讀書處：“雨霧長茫茫，煙雲滿蒼山。銀珠垂春草，深枝聞啼鵲。”這是當年最自以為得意的一首詩。到1978年9月，上大學前夕，將歷年所作篇什抄錄成冊，取名《自珍集》，寓敝帚自珍之意，並積存有詩詞等文學作品及文學理論著作的抄本十餘冊。

由於高考語文成績平平，歷史成績在全省名列前茅，被取入中山大學歷史系，而未能成為中文專業的學生。雖然不無遺憾，但很快醉心於古今中外的歷史和治學門徑的求索。1982年大學畢業，留校擔任歷史學家、民族學家戴裔煊教授的學術助手。次年，奉戴先生之命協助他研究澳門史，直到他於1988年去世。整整十年，幾乎忘記了原來酷愛的古典詩詞。祇是在大學時讀過陳寅恪先生的《元白詩箋正稿》，畢業後讀戴先生和許多知名學者的史學論著，多以古詩詞作為史料，對前輩學者淵博的文史學知識，和亦文亦史的治學風格，雖不能至，心嚮往之。

不久，一個偶然的機會，使我開始在文學和史學相結合方面做些嘗試。1989年春，澳門文化學會（先後改稱文化司署、文化局）到中山大學徵求學術研究獎學金入選，研究範圍包括中葡關係與澳門歷史文化，校科研部門催促應徵。因請教當時主持歷史系科研工作的蔡鴻生師：將中國人所作有關澳門的詩詞收集起來，用文學和史學兩種方法加以整理，使之既有文學價值，又有史料價值，反映澳門歷史文化的一個側面，是否可以作為研究項目？獲得認可，因將項目定名為“澳門詩詞箋注”。並承當時主持校港澳研究所工作的雷強師應允，作為項目的導師。

項目很快獲得批准，由此開始搜集澳門詩詞有關資料。先從中山大學圖書館開始，承古籍部蘇威先生等的關照，破例准許進入書庫，凡有可能找到明清、晚清至民國詩集的書架，一本本、一層層、一架架地搜尋、抄讀，將上百架藏書翻了個遍。接着又到廣東省中山圖書館，大學同學、該館廣東地方文獻部負責人倪俊明兄等亦甚關照，遂將館藏文獻目錄、卡片所載粵人詩集盡量搜尋、抄讀。每天早出晚歸，午餐後在倪兄宿舍稍事休息，晚上返回家中，繼續整理白天抄讀所得。稍後又移至該館善本室、古籍部，以及華南師範大學圖書館、暨南大學圖書館抄讀。並於1990年春至澳門搜集資料及實地考察，1991年夏至北京、上海各大圖書館訪書、抄讀。前後歷時兩年，翻閱、抄讀詩歌總集、別集及文集、筆記、方志、族譜、碑刻等有關文獻數千種，搜集到明清至民國時代有關澳門的詩詞千餘首。至此，除1997年夏至中山市搜集補充資料外，搜集資料的工作已基本完成，遂轉入詩詞箋注的工作。

為了使自己從中國古典文學的業餘愛好者，提高到接近專業研究者的水平，在搜集資料的同時，以及箋注每一卷之前，陸續補讀了古今學者有關詩詞箋注及詩詞學研究的著作近百種。並承本系姜伯勤師示教：詩詞箋注著作有三種層次，一是僅靠翻翻工具書，對典故略加注釋而成；二是對用典及字面史料有較好的箋釋，且有一定的研究；三是對作者和作品本身及其時代皆有深入的研究，具有文化史的價值。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名家黃天驥師亦時予指授，令人深受教益。又有感於“詩人得江山之助”之說，以為箋注詩詞最好能對作品所描寫的山川景物作實地考察，以領略對詩詞意境的實際感受。因而在澳門考察的一個月中，走遍澳門半島及氹仔、路環兩島的山隈海曲、廟宇教堂及風光幽勝之處，徒步從一個景地到另一個景

地。其後至澳次數漸多，不少景地且多次盤桓。凡此種種，皆為箋注打下基礎。

本書大致採用這樣一種體例：詩作之前為作者小傳，述其生卒年里、生平身世及其與澳門的因緣，力求知人論世。詩作之後為注釋，除以常用工具書詮注典實外，歷年研究澳門歷史文化所得及其他有關論著的資料亦一併錄入，以存文獻。注釋之後為說明，有關作品的寫作年代、思想內容、藝術特色等等，凡注釋中不便載入者皆繫於此。其編次各個詩人之間以其至澳時間先後排列；同一詩人的作品，以其寫作年代先後排列。全書分為明清（至1840年）、晚清（至1911年）和民國（至1949年）三卷，每卷的卷首有導言一篇，對各卷的時代背景、重要詩人及作品的思想內容、藝術特色作一個初步的研究和概括。

有一位文史學界的前輩學者曾在贈書中題句云：“翻殘燈火三更雨，負盡鶯花二月天。”經過近半年的日夜苦戰，1992年春，完成《澳門詩詞箋注·明清卷》，送呈黃天驥、蔡鴻生、雷強諸師審定，獲得許可。澳門名詩人、學者梁披雲先生、李鵬翥先生亦勉勵有加，時予督促，使人深受鼓舞。1996年冬，完成《晚清卷》。1997年冬，完成《民國卷》。旋轉入修訂舊稿，校訂清樣，為本書的出版作準備。而全書出齊，恐怕要到2002年，前後歷時十餘年。古詩云：“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箋注者無意自炫，經過十餘年的磨拭，已經磨成一把一出匣便光芒四射的寶劍。但為經過十餘年的艱苦努力，能夠在澳門歷史文化研究中，為弘揚中華文化，促進中西文化交流做一件有意義的工作，感到由衷的欣慰。而其中的甘苦，大約祇有認真做學問或真正重視學術文化的人纔能體會到。昔年的青青鬢髮，如今染成繁霜，似可為其中甘苦的見

證。

古人言：“世人之著述焉能無錯。”在修訂書稿的過程中，自以為從一個中國古典文學的業餘愛好者，到專業研究者之間，畢竟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已完成的書稿中一定存在着不少誤漏，更何況其中一部分因時間匆促，撰稿時不計工拙，須請對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有素的專家嚴加審訂。承學長陳永正教授不棄，前後耗去超過兩月的工作時間，細閱全部書稿，以其長期箋注古典詩詞的工力和從事舊體詩詞創作的經驗，每一卷都訂正了數十條至上百條的誤漏，使本書避免了多處硬傷，並增添許多勝解。其所訂正各條，絕大多數為箋注者所採納，個別不敢苟同之處，亦將其意見載入書中，兩說並存，以待達者。至於書中仍存在的誤漏，自應由箋注者負責，並期待有關專家和讀者的教正。

“澳門詩詞箋注”作為澳門文化局（前文化司署）的學術研究獎學金資助項目，該機構的前任主席（司長）彭慕治先生（Jorge Morbey Ferro Ramos Pereira）、馬若龍先生（Carlos Marreiros）、布嘉麗女士（Gabriela Romiro Pombas Cabelo），前任局長王增揚先生和現任局長何麗鑽小姐始終對這一研究項目給予重視和支持。原副司長魏美昌先生，和黃曉峰、徐新、白偉龍（João Branco）、鄧思平諸先生，冼麗莎（Tereza Sena）、李淑儀、陶倍信諸小姐，亦給予許多關注和幫助。其中冼麗莎、李淑儀小姐作為該機構研究部門負責人，徐新、鄧思平先生作為本書編審兼責任編輯，助力尤多。本書改由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與珠海出版社聯合出版以後，珠海出版社副總編輯、編審羅立群先生、編輯帥雲小姐又給予大力支持和幫助。

在完成這一研究項目的過程中，給予關注和幫助的還有：

新華社澳門分社冼為鏗先生、陳惠君女士，澳門日報社李成俊、陳樹榮、楊永權諸先生，澳門華僑報社佟立章，澳門大學黃漢強、譚世寶、陳頌聲、鄭煒明、鄧駿捷諸先生，澳門中華教育會劉羨冰校長，澳門基金會吳志良先生，澳門教青局陳繼春先生，澳門培正中學黃就順先生，澳門歷史檔案館劉芳小姐，澳門實業家吳利勳先生，文史研究專家方寬烈先生，文物鑑藏家沙巴治先生（António Manuel Sapage），澳門媽祖閣、蓮峰廟、普濟禪院住持機修法師，天主教澳門教區主教林家駿神甫，香港中文大學黃坤堯先生，廣東省文史研究館莫仲予、莊福伍先生，廣東省中山圖書館林子雄先生，中山市中山詩社陳占勤、李浩、張拔群諸先生，暨南大學湯開建先生，中山大學胡守為、許錫揮、鄭天祥、林悟殊、鄧貴忠、郭小東、王川諸先生，我的研究生黃景聰、董少新、管亞東、魏雅麗、方莉諸君，內人詹小芳等等。

經黃天驥師敦請，著名學者、詩人王季思先生在逝世的前兩年為本書題箋。近復承著名學者、詩人饒宗頤先生和梁披雲先生、李鵬翥先生為本書題詞，黃天驥師在剛剛完成編校《董每戡先生全集》這一鉅大文化工程之後，立即通讀全稿，為本書作了一篇極富才情和學術睿智的序言。皆令人深受鼓舞和鞭策。

在本書即將出版之際，謹向以上諸位前輩學者、師長、友人，和澳門文化局、珠海出版社的諸位先生、女士、小姐表示最誠摯的謝忱。並祈望今後能續成本書的《當代卷》和《續編》，繼續為澳門歷史文化研究的繁榮盡綿薄之力。

1998年12月9日澳門礮臺山下旅舍初稿

2002年2月9日廣州河南康樂園五稿

導言 明清時代的澳門詩詞

一 引言

中國是一個具有悠久文明的泱泱大國，也是一個詩的國度。在數千年的中華文明史中，詩歌始終是最重要的文學形式之一，它以凝煉的語言和特有的節奏韻律，飽含着詩人們豐富的思想感情和想象力，高度集中地反映社會生活和時代風貌。歷代詩人留下的無數詩篇，豐富了華夏文明的寶庫，蘊含着豐富的歷史文化內涵。

澳門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從明代嘉靖三十二年至三十六年（1553～1557）葡人入據澳門以後，到清代道光二十年（1840）鴉片戰爭爆發前夕的近三百年，構成澳門歷史上的明清時代。明清時代的澳門，作為葡萄牙人在中國領土上的居留地，以及來華貿易的其他西方各國商人的共同居留地，是一個重要的東西方貿易港口，也是天主教在遠東的傳播中心。在這樣一個海疆要地，中國居民與外國居民雜處而居，中國政府在這裏設官置戍、徵收稅課，有效地行使統治權。

明清時代居住在澳門或曾經到過澳門、關注着澳門的中國詩人，都向這片中國領土傾注自己的熱情，正如黃天驥師《澳門普濟禪院詩碑序》所描述的：“神州騷客，常乘興以南遊。嶺嶠英才，因風雲而際會。囊書仗劍，筆墨淋漓。或寄傲於榕陰，或騁懷於沙嘴。撫煙霞之變幻，慨邦國之廢興。覽潮汐之漲消，紓胸襟之積愜。於是晴川芳草，盡入詩題。鶴渚鳬汀，遍留鴻爪。”當年中國詩人所留下的詩篇，

從一個側面展現了明清時代的澳門豐富多采的歷史畫卷。

1994年4月，本書箋注者曾至澳門大學作題為《澳門媽祖閣碑刻的中國歷史文化內涵》的學術講演，談到：“古代澳門雖然僻處海隅，但作為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居住在澳門或曾經來過澳門的中國人，與居留在澳門的葡萄牙人及其他外國人一起，留下了豐富的歷史文化遺產。這些歷史文化遺產的根，一頭在中國內地，一頭在歐洲，特別是葡萄牙。”

（拙著《澳門與中華歷史文化》，澳門基金會1995年，頁272。）

本卷選入明清時代七十位中國詩人吟詠澳門的詩詞二百七十五首，便是古代澳門豐富歷史文化遺產的一部分，從對詩詞的作者及其時代、作品內容和藝術特色的分析，可見中國文化在澳門的強大影響，而從詩詞內容中關於中西文化交流的描寫部分，又可見西方文化特別是葡萄牙文化的影響。

二 作者及其時代

明清時代吟詠澳門的中國詩人，就其社會身份而言，大約可分為官員、士紳、商賈、僧人、天主教士及明朝遺民。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明朝遺民及清朝官員。

明清易代之際，神州板蕩，山河泣血，在政治上忠實於明朝的漢族士大夫，以不同形式反抗滿清貴族的統治，由此形成人數眾多的明朝遺民階層。清代澳門詩的作者中，屬於明朝遺民的便有張穆、吳歷、屈大均和釋跡刪。

張穆（1607～1686年稍後）字穆之，號鐵橋，廣東東莞人。崇禎甲申之變，設位哭於故鄉茶山，入閩投効唐王聿鍵，與張家玉募兵惠潮，唐王敗後，旋以事不可為，返鄉歸

隱。他於順治十六年（1659）遊覽澳門，寫下五古《澳門覽海》。這首詩的開頭“生處在海國，中歲逢喪亂”二句，抒寫了邦國淪亡之痛。其時清朝的統治已日益鞏固，使詩人發出無可奈何的感歎：“豪懷數十年，破浪已汗漫。”“狂瀾渺何窮，萬里生浩歎。”然而，在他的心中，仍然懷着深重的遺民情結：“西夷近咸池，重譯慕大漢。”所謂“大漢”，與其說是代指當時統治中國的清王朝，毋寧說是暗指已經失敗的漢族王朝明朝。

屈大均（1630～1696）字介子，號翁山。廣東番禺人，十八歲隨師陳邦彥起兵抗清，獨當一隊。年二十，父歿，禮天然和尚函是為僧，法名今種，後棄僧返儒。曾東至會稽，參與魏耕、祁班孫通鄭成功之謀；北至燕代，與顧炎武、李因篤共謀恢復之計。晚年奉母鄉居，著述以終。約在康熙二十四年至二十九年（1685～1690），屈大均寫下澳門詩十餘首。其時詩人已進入晚年，仍然保持明朝遺民的晚節，然同張穆晚年一樣，恢復無望，壯心已灰。其吟詠澳門的詩篇，並未直接抒寫深重的遺民情結，而是借澳門這塊中國領土上的葡萄牙居留地，抒寫自己的民族感情，以及澳門的山川勝景、西方事物和清政府開放海禁以後頗為繁盛的東西方貿易。

清初的明朝遺民，除了武裝反抗清朝征服者，圖謀恢復之外，另一種反抗的方式就是逃禪，即出家為僧，遁入叢林。這種反抗形式為許多明朝遺民所採取，以致當時的嶺南詩人易宏有句云：“十年王謝半為僧。”屈大均之由儒遁釋，又由釋返儒，可以說是一個奇特的例子。而嶺南高僧釋跡刪，與在澳門普濟禪院留下日記墨寶的澹歸今釋一樣，逃禪之後，以寺院的晨鐘暮鼓、青燈黃卷為伴，渡過人生的最